

林學忠主編：《城大文史芻論：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文學碩士論文集》第四輯
（香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2025年6月）

梅堯臣詩對阮籍接受之初探

徐雅琪

摘要

阮籍作為「竹林七賢」之首、正始之音的代表之一，無論其詩歌本身還是個人風神，都對後世文人的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宋初，梅堯臣作為詩壇之開拓者，奠定了唐風到宋調的轉變。梅詩及詩題中共 54 首直接提及阮籍，常以「阮籍」、「嗣宗」、「步兵」出現。本文將以梅堯臣詩為切入點，結合梅、阮二者人生經歷、所處時代背景探究梅堯臣對阮籍的接受。

關鍵詞

梅堯臣 阮籍 接受

一、前言

在阮籍（210-263）詩歌的接受史上，從兩晉時期左思（250-305）的《詠史詩》、郭璞（276-324）的《遊仙詩》，到南北朝時江淹（444-505）的《效阮公》、庾信（513-581）的《擬詠懷》，再到唐代陳子昂（659-700）的《感遇詩》，或隱或顯、或模擬或開拓繼承，都可以尋覓到阮籍《詠懷詩》之蹤跡。到了宋代，阮籍及其詠懷詩似乎已經成為一個符號化的意象在文人作品中被援引。

宋初詩壇主要受晚唐五代詩風之影響，出現了白體、晚唐體及西崑體，多為模仿，沒有獨立起來。自歐（歐陽修，1007-1072）、梅（梅堯臣，1002-1060）、蘇（蘇舜欽，1008-1049）開始，力圖改變晚唐五代之流弊，倡導了一場詩文革新運動，為宋初詩壇指引出新的審美方向。梅堯臣作為宋初詩壇的開拓者，其詩歌風格在不斷的探索中變化，逐漸展現出題材的日常化、語言的俚俗化、對現實的深切關懷等特點，正對應其詩論的「遇事而發」和「造平淡」兩個主張，¹奠定了詩歌從唐風到宋調的轉變。梅堯臣詩，尤其晚年，曾數十次提及阮籍，甚至將阮籍推崇到一個與李（李白，701-762）杜（杜甫，712-770）、甚至孔子（前 551-前 479）相當的地位。例如〈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中提到「首觀李與杜，驢上瞑目醉」，²此景為詩人在朋友家中觀其藏畫作，以「阮籍騎驢上東平」入畫，可猜想得知當時在宋人心目中阮籍故事之經典、為人稱道；另，〈嚙正仲所遺撥醅〉中提及「豈乏阮李詩與真，淺飲強對春風妍」，³以阮籍和李白作比，借對前人飲酒吟詩、率性放達之欽羨，抒發了自己鬱鬱不得志之惆悵；〈緡叔以詩遺酒次其韻〉中寫道「百觚孔聖不可擬，白眼步兵吾久師」，⁴更是將阮籍提到了一個僅次於孔子之下的「師長」高度。下文將先對梅堯臣關於阮籍的詩按時間進行概述，再從意象的搭配、典故的運用進行梅堯臣對阮籍風神接受的探究，最後簡析梅堯臣對阮籍《詠懷詩》的接受與繼承。

二、梅堯臣「涉阮」詩概述

按照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所收錄的篇目，自天聖九年（1031）至嘉祐五年（1060），梅詩中共有 54 篇提及阮籍，另作有《詠懷》七篇，亦深受阮詩風格影響。上述 54 篇「涉阮詩」中，共有五篇在題目中直接提及，例如慶曆六年（1046）過尉氏縣阮籍墓所作緬懷之篇〈尉氏縣阮籍嘯堂〉，又如皇祐五年（1053）的擬詩之作〈效阮步兵一如復一日二首〉。另有五十一首在詩句中以「阮籍」、「阮生」、「步兵」、「嗣宗」、「阮家」等形式直接或間接涉及阮籍其人及其典故，例如皇祐元年（1049）秋夜難眠所作〈夜坐〉中寫到，「聊為詠懷篇，還想阮步兵」；⁵又如至和三年（1056）和友人孫甫新栽竹子所作之〈依韻和新栽竹〉，「不向阮家林下集，還思渭北水邊窺」。⁶牛苗苗依據梅堯臣創作心態的演變對梅堯臣生平

¹ 林宜陵：《北宋詩歌政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頁 263-267。

²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848。

³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720。

⁴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1082。

⁵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517。

⁶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842。

進行分期，⁷筆者受其啟發，亦將梅堯臣詩歌分為三個階段，但根據梅一生中在政治上的浮沉，即經歷第一次黨政、晚年得以升遷，劃分結果與牛文稍有不同。

第一階段為天聖九年（1035）至景祐二年（1035）。此時梅堯臣正值青年，意氣風發，受叔父梅詢（964-1041）蔭補任河南縣主簿，深受上司西京留守錢惟演（977-1034）和妻兄西京通判謝絳（994-1039）的提攜，並與好友歐陽修、尹洙（1001-1047）等人形成了當時頗具影響力的洛陽文人集團。此時梅詩還大多停留在山水庭院、夏夜小池的記遊階段，詩風清麗明快。在此期間梅詩涉阮籍共三首，分別為天聖九年所作的〈依韻和希深雨後見過小池〉、〈新秋普明院竹林小飲詩得高樹早涼歸〉以及景祐元年（1034）所作的〈擬王維偶然作〉。

第二階段為景祐三年（1036）至皇祐二年（1050）。在這長達 14 年的時間中，梅堯臣經歷了時間和命運的打磨，政治上的邊緣化和生活中親友的相繼離去使其心態逐漸發生了變化，開始關注現實，詩歌風格也一定程度上受現實生活的影響，呈現出向古淡、瘦硬變化的趨態：景祐三年朝中黨爭愈演愈烈，友人因黨爭遭貶，他憤而作〈猛虎行〉譏諷異黨；景祐五年（1038）再次落第，令他心灰意冷；寶元二年（1039），對梅堯臣早期影響非常深的摯友兼妻兄謝絳病逝；寶元三年（1040）西夏攻宋，他心懷報國之志卻不得重用；康定二年（1041），自少扶植他成才的叔父梅詢病故；慶曆四年（1044）喪妻，慶曆五年（1045）喪子，友人尹源（尹洙之兄）離世。⁸這十四年間阮籍只出現了九次，其中三次在皇祐元年被提及，三次在題目中提及（一為題畫詩〈詠王右丞所畫阮步兵醉圖〉，一為擬作〈謝師厚歸南陽效阮步兵〉，一為緬懷詩〈尉氏縣阮籍嘯堂〉）。也就是說，自景祐三年至皇祐元年以前的 12 年中，阮籍被梅堯臣提及在詩句中僅三次，頻率極低。

第三個階段為皇祐三年（1051）至嘉祐五年梅堯臣離世。皇祐三年，梅堯臣的仕途終於得見起色，在眾多在朝友人的推舉下得到仁宗（趙禎，1010-1063，1022-1063 在位）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為太常博士，此後累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直至嘉祐五年去世，這一階段為梅堯臣的晚年時期。⁹此九年間，梅堯臣所作涉阮籍詩多達 42 首，佔全部涉阮詩的三分之二以上，數量上相較於前兩個階段有大幅提升，內容、題材比較廣泛，詩題多為社交、酬唱之作。僅皇祐五年（1053）一年間所作提及阮籍之詩數量就多達十首，情感飽滿、真摯，平鋪直白地表達了梅堯臣對阮籍個人及其創作風神的傾慕。例如皇祐五年〈赴刁景純招作將進酒呈同會〉中寫道「計較無以過，試共阮籍謀」；¹⁰又如至和二年（1055）所作

⁷ 牛苗苗：〈梅堯臣詩歌創作心態及其詩風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頁 4-5。

⁸ 朱東潤：《梅堯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30-48。

⁹ 朱東潤：《梅堯臣傳》，頁 87-183。

¹⁰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693。

〈朝二首〉(其二)之「是非不道任挑撻，唯憶當時阮步兵」；¹¹再如嘉祐二年(1057)所作〈依韻和永叔內翰西齋手植菊花過節始開偶書見寄〉中言「常愛阮嗣宗，遇酒醉則倒，杯中得賢趣，世上逐金裊」，¹²分別以不同稱謂將阮籍寫入詩中，從多角度勾畫出了性格飽滿的、圓形的阮籍形象——嗜酒且易醉、率真而曠達。

由上述三個階段中涉阮籍詩歌的數量變化可推斷，梅堯臣在晚年時期有意或無意地，對阮籍的推崇和接受程度有所提高，其原因或影響因素絕非單一，值得進一步探究。後文將從具體文本着手，結合梅堯臣自身思想、整體時代環境特徵等因素，分析梅堯臣對阮籍詩的接受情況。

三、符號化的阮籍——酒與竹的意象搭配

關於「符號化」，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希爾(Ernst Cassirer, 1874-1945)把人定義為符號的動物，「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爲，是人類生活中最富於代表性的特徵」。¹³這種「符號化」上升到人類精神文化活動的層面，則表現為語言傳達文學功能的表義性、概括性、抽象功能等方面。文學作品中所使用的情感符號，更是融入了創作主體(作者)對外部世界的直接感受，情感符號也成為主客觀結合的產物，成為主體對物的觀念而非物本身。¹⁴前文提到，梅堯臣詩共54首涉及阮籍。這五十四首詩中，或題材、或內容，有22首與「酒」或「醉」有關，十五首與「竹」有關，在全部「涉阮詩」中佔較大比重。可見阮籍在梅詩中的出現似乎已經與「酒」和「竹」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搭配。梅堯臣將自己作為後人對於阮籍其人、其事跡的臆想和認同程度帶入詩中，使梅詩中的阮籍形象超越了阮籍其人的本體存在，成為梅堯臣個人期待的情感符號的載體。

(一) 對「酒」當歌

中國的「飲酒」文化早已超越了傳統的飲食行爲，上升為一種內涵豐富的文化活動，與人的精神生活息息相關。魏晉時期，酒文化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重要時期，「飲酒」這一活動被推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酒與文學開始緊密結合起來。王瑤(1914-1989)在〈文人與酒〉中將飲酒之風盛行的原因指向魏晉士人對於生命的留戀，和對於死亡突然來臨的恐懼。¹⁵一方面通過飲酒達到物我兩忘、回歸自然的超脫境界，在醉酒中感慨人生無常，思考人

¹¹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768。

¹²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977。

¹³ [德]恩斯特·卡西爾著，甘陽譯：《人論》(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頁47。

¹⁴ 辛衍君：《唐宋詞意象的符號學闡釋》(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7)，頁44-46。

¹⁵ 王瑤：〈文人與酒〉，載馮友蘭、李澤厚等著，駱玉明、尚能選編：《魏晉風度二十講》(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頁201。

生價值；另一方面借飲酒娛樂消愁，增加生命密度，與友人疏通感情、維繫社會關係。「飲酒之風的盛行雖始於漢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酒才幾乎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徵」。¹⁶社會動盪、時代流弊使文人不得不通過飲酒這一行爲來思索人生、逃避現實。魯迅（1881-1936）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寫道：「正始名士服藥，魏晉名士飲酒……嵇康（223-262，一說 224-263）也兼服藥，而阮籍則是專飲酒的代表。」¹⁷《世說新語》也提到阮步兵好酒：「步兵校尉缺，廚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爲步兵校尉」。¹⁸足可想象此人行爲率性放誕、嗜酒如命。《苕溪漁隱叢話》中載：「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¹⁹可見，除了借酒抒懷之外，在當時司馬氏的政治高壓之下，不論阮籍的「醉酒」還是「嘯」都是一種逃避現實和自保的行爲，他們（文人）不得不韜光養晦、不得不沉湎，以表面的不羈掩飾內心的苦悶。²⁰魏晉酒文化的盛行及酒對文人廣泛而深遠的奇妙影響，使阮籍的人物形象在梅堯臣詩中頻繁與「酒」意象伴隨出現。

梅堯臣亦嗜酒，常在詩中坦言「愛酒」。例如〈依韻和永叔勸飲酒莫吟詩雜言〉中提到「我生無所嗜，唯嗜酒與詩」，²¹又如〈寄潘歙州伯恭〉：「我貧性愛酒，有酒無錢沽」。²²梅詩中共計 407 條提及「酒」意象——聚會要飲酒（〈九日永叔長文原甫景仁鄰幾持國過飲〉：「置酒延羣公，掇英浮新黃」），²³送別要飲酒（〈醉中留別永叔子履〉：「便步髯奴呼子履，又令開席羅酒卮」），²⁴夜晚閒來無事也要飲酒（〈永叔進道堂夜話〉：「夜闌索酒卮，快意頻舉挹」）。²⁵他渴望如阮籍一般真率豁然，可以酩酊大醉，興起而作詩，也希望能同他一般，乘着酒興將一切的不順與打擊、功與名忘卻於九霄雲外。在〈次韻和吳冲卿歲暮有懷〉中，他寫道：「舊曆卷將盡，慨然增永懷，唯希步兵醉，莫作太常齋。孟浪從人笑，疎愚共世乖，定知當汨沒，名不與功偕。」²⁶雖然梅堯臣的一生中始終流連官場，未免於塵俗，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始終讚美、渴望阮籍身上的魏晉風度、文人傲骨；也欽羨古代文人縱情詩酒，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的魄力。久而久之，抑或因年歲漸長，梅堯臣與阮籍產生了

¹⁶ 王瑤：〈文人與酒〉，頁 204。

¹⁷ 魯迅著，曾彥修等編：《魯迅選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頁 141。

¹⁸ （南朝宋）劉義慶著，金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香港：中華書局，2012），頁 858。

¹⁹ （清）胡仔纂集：《苕溪漁隱叢話 前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頁 24。

²⁰ 王瑤：〈文人與酒〉，頁 208-209。

²¹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926。

²²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800。

²³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1117。

²⁴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186。

²⁵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458。

²⁶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1068。

相似的人生觀：在〈刑部廳海棠見贈依韻答永叔二首〉（其二）寫道「人生若朝菌，不飲老奈何，楊雄寂寞居，豈若阮生歌」，²⁷與阮籍在其詠懷詩中所言「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²⁸有同樣超脫之意境。雖然同樣感到生命如螻蛄朝菌般短暫苦澀，前者更加偏重及時行樂，後者則給人看淡萬物、依靠酒精自我麻醉之感。梅詩中的阮籍與「酒」意象成爲了梅堯臣在時代逆境中對於魏晉文人風度之崇敬的精神寄託。

（二）君子好「竹」

與「酒」意象相似，「竹」這一審美意象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亦爲歷代文人所廣泛使用。由於竹子本身蒼蒼子立，高大、成節、中空等自然特質與君子的清高、正直、虛懷若谷的品性相通，故成爲君子內在精神品質的一種較爲固定的物態表現形式，被賦予「君子」的擬人化的色彩。²⁹但真正將「竹」文化推向一個恆久性的審美領域，以致於到了唐宋時期竹子成爲「君子」的固定代名詞，得益於魏晉時期流行文化的推動。孟慶東指出：

魏晉時候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也可以說是注重自我的時代，尊重個性，卓犖不羈，魏晉人用自身的行爲對『竹』進行了一種精神上的灌注，豐富了『竹』的內容，將『竹』推入了美學領域，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使『竹』趨向呼之欲出的審美意象。³⁰

《世說新語·任誕》載王子猷（338-386）「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當別人問起只是暫居之地何必如此大費周章時，他則指着竹子說：「何可一日無此君！」³¹王子猷愛竹的故事經世代流傳，後世詩人便常以「此君」來代指竹子，且宋人藉此典故入詩的數量較前代而言尤爲眾多——如張孝祥（1132-1169）的「康樂亭前種此君」（〈浣溪沙〉），³²蘇軾（1037-1101）的「此君知健否，歸掃南軒綠」（〈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其三·竹〉），³³陸游（1125-1210）的「今朝林下煨苦笋，更覺此君風味高」（〈即席〉），³⁴梅堯臣的「不可一日無，蕭灑看未足」（〈刑部廳看竹孟郊體和永叔〉）……³⁵可以見得宋時竹文化已與君子氣節緊密相聯。

²⁷（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933。

²⁸（晉）阮籍著，羅仲鼎譯解：《阮籍詠懷詩譯解》（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119。

²⁹李紅娥：〈宋代竹文化及其現代應用研究〉（浙江農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頁 6。

³⁰孟慶東：〈中國古典文學中「竹」的審美意象〉（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頁 11。

³¹（南朝宋）劉義慶著，金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893。

³²（宋）張孝祥著，辛更儒校注：《張孝祥集編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1188。

³³（宋）蘇軾著，（清）王文浩輯註：《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 1004。

³⁴（宋）陸游著：《陸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1390。

³⁵（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930。

以阮籍爲首的「竹林七賢」撫琴長嘯、酣歌痛飲的事跡更爲後世所傳頌，成爲「魏晉風度」之典範。³⁶他們寄情山水、隱逸竹林、不願諂媚的氣度與竹之「清風傲骨」、「超然灑脫」相契合，這種流行文化綿延至於唐宋時期，「竹林」逐漸成爲賢者、名士、交遊活動的代名詞。

梅堯臣現存詩中，「竹」意象的出現頻率僅次於「酒」，提及詩目約佔全部詩作的十分之一。在涉及阮籍的詩中，竹則更多與「君子」緊密聯繫起來，「竹」意象的表現形式也較爲多樣化。從這些詩的題材上來看，很多是社交所作的和詩，有賀友人喬遷之喜，也有一些送別詩、記遊詩。從具體內容上來看，這些包含「竹」意象的詩中，共有超過半數（七首）以「阮家」代指竹林。例如〈和刁太博新墅十題其七·移竹〉中寫道：「直須探作阮家趣，更向煙林缺處栽」；³⁷〈寄題劉仲叟澤州園亭〉的「既移洛陽花，又種阮家竹」；³⁸〈獻甫過〉的「幾樹桃花夾竹開，阮家閭巷長春苔」。³⁹從此可推斷，在當時文人喬遷新居後，栽竹很可能作爲一種追求雅致的名士風尚，在上層社會頗爲流行。也可見直至宋代，梅堯臣見到新栽之竹，仍會自然聯想到竹之君子氣質，腦海中浮現出當年阮籍爲首的七賢竹林飲酒、長嘯之場面，落筆成詩。以上幾首包含「阮家」的詩中所描繪的場景物像，多爲茂林脩竹幽徑之類，給人以「靜謐」、「幽居」的印象，可以聯想出梅堯臣內心「阮家竹林」之文人理想世界的環境，似乎也暗示着自己與友人見的君子之交。此外，在〈依韻馬都官宿縣齋〉和〈翠竹亭〉兩首詩中，梅堯臣都將陶潛（352 或 365-427）和阮籍聯繫在一起：「常愛陶潛遠世緣，阮家仍有竹嫵娟。」⁴⁰「酒有陶公愛，林希阮氏賢。」⁴¹事實上，梅堯臣在其詩中，從先秦時的屈原（約前 340-前 278）到唐朝的韓愈、孟郊（751-814），提到過許多前代詩人，但其中陶淵明和阮籍出現的頻率最高。⁴²而無論是陶淵明還是阮籍，都帶有一種淡泊灑脫的出世態度。陳寅恪先生在其《金明館叢稿初編》中將這種態度解釋爲「政權不合作」。⁴³這種不合作的具體表現則是「隱逸」——陶淵明歸園田居、採菊東籬，阮籍竹林長嘯、借酒佯狂。因而，當陶淵明與阮籍聯繫在一起時，詩中便自然而然地賦予了竹林隱逸的氣質。

梅堯臣將「竹」意象與阮籍聯繫起來的詩作中，有以「阮家」代指竹林者，有借竹林

³⁶ （南朝宋）劉義慶著，金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頁 852-854。

³⁷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200。

³⁸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1127。

³⁹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774。

⁴⁰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728。

⁴¹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550。

⁴² 〔日〕橫山伊勢雄著，張寅彭譯：〈梅堯臣的詩論〉，《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 年第 2 期（2 月），頁 53。

⁴³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201-229。

懷念阮籍者，有將「陶酒」、「阮竹」並提者，可以看出梅堯臣已在前人對於「竹」傳統意義上的理解中有所突破，賦予了竹意象更為豐富的、人格化的氣質。另一方面，如「阮家林」、「阮家竹」等用詞也可以進一步印證作者有意將自己心目中的阮籍形象與「竹」之君子氣質相互連結起來，予阮籍以竹之「本固」、「節貞」，也予竹以阮籍之「淡泊」、「隱逸」。綜合上文所述，不論是「酒」或者「竹」，皆被賦予了梅堯臣在自己所處之時代環境中所定義的新概念，使阮籍成為理想文人的「符號化」的形象出現在詩句中——嗜酒易醉、率真放達的翩翩君子。

四、晚年對阮籍推崇程度提高

本文第一部分關於梅堯臣「涉阮」詩的概述中提到，在梅堯臣的晚年時期——從皇祐三年（1051）至嘉祐五年（1060）這九年間，涉及阮籍的詩多達 42 首，佔全部「涉阮」詩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內容也較前期更為豐富。足以說明梅堯臣在晚年時期，自覺或不自覺地對阮籍和其思想、作品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下文將就梅堯臣晚年時期對阮籍推崇程度明顯提高的原因進行探究。

（一）英雄遲暮的淡泊

1. 儒家之道與莊老之學的碰撞

魯迅說建安時代是「文學的自覺時代」；⁴⁴李澤厚在其《美的歷程》中提到，「從東漢末年到魏晉，意識形態領域的新思潮的基本特徵是『人的覺醒』」；⁴⁵余英時將這種亂世中士族群體的人格獨立稱為「士之個體自覺」。⁴⁶由於當時社會正值更迭之際，漢代大一統秩序的終結、傳統禮法的崩壞、老莊思想盛行、隱逸之風與玄學的興起等諸多元素的共同作用，文士的思想開始悄然變化，形成獨特的魏晉風度。⁴⁷阮籍便是當時時代中覺醒的「士」之代表。論及阮籍的家世，〈竹林七賢論〉載：「諸阮前世皆儒學」。⁴⁸阮籍之父，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165-212）年少時曾受學於漢末經學大家蔡邕（133-192），阮籍本該成為傳統

⁴⁴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載魯迅著，曾彥修等編：《魯迅選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頁 137。

⁴⁵ 李澤厚：《美的歷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頁 87。

⁴⁶ 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頁 269-286。

⁴⁷ 孫良水：《阮籍審美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 40-55。

⁴⁸ （東晉）戴逵：〈竹林七賢論〉，載（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2254。

儒學的繼承者和捍衛者。但根據《晉書·阮籍傳》的記載，他「博覽羣籍，尤好莊老」；⁴⁹他的 82 首五言《詠懷詩》亦是突破了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⁵⁰體現出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在行為表現上，更是越禮驚俗、放言忤世。

阮籍自少時受儒學浸潤，聰穎通達，曾立志成為顏回（前 521-前 481）、閔子（前 536-前 487）那樣的賢者。⁵¹即使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寄情於莊老之學，作〈達莊論〉、〈通老論〉，寫出「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⁵²表面上超然出世、不循禮法，但從其作品中依然能窺探出阮籍骨子裏對真正的禮法之尊重與維護。例如〈詠懷其四十五〉的「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為動，非法不肯言」，⁵³正是對孔子「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言」⁵⁴的肯定。在〈詠懷其十九〉中，阮籍寫道：「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⁵⁵清人何焯（1661-1722）評價此詩：「此言少時敦味詩書，期追顏、閔，及見世不可為，乃蔑禮法以自廢，志在逃死，何暇顧身後榮名哉？」⁵⁶何焯認為阮籍自少飽讀詩書，深諳儒學之道，之所以佯狂「自廢」，是避禍求生的不得已之舉，更無暇顧及功名利祿。事實上，相對於嵇康的寧折不彎，阮籍選擇的是明哲保身。從他詠懷詩的憂生之嗟（「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⁵⁷和其行為的謹小慎微來看，阮籍確實有對現實無奈和妥協的心理特質，滿腔的鬱憤和壯志都只能在詩中發洩。一方面內心深處的儒學傳統思想早已根深蒂固；一方面由於政治原因，又在思想上成為莊子學說的倡導者，與嵇康共同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⁵⁸在〈大人先生傳〉中批判儒家立法名教「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⁵⁹正是這兩種思想的交融又碰撞，造成了阮籍在感性上的社會責任感與理性上樹立「大人先生」人格的衝突，始終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徘徊。

生於盛世的梅堯臣從少時起跟隨叔父梅詢四處交遊。年輕時積極進取、渴望建功立業，胸懷報國之志，壯年時在〈依韻和李君讀余注孫子〉中曾寫道，「我世本儒術，所談聖人篇，聖篇辟乎道，信謂天地根」。⁶⁰與阮籍相同，他也痛恨「偽儒」，其〈盜儒〉中寫道，「其衣

⁴⁹（唐）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49〈阮籍傳〉，頁 1359。

⁵⁰（春秋）孔子著，劉兆偉譯註：《論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頁 236。

⁵¹可參〈詠懷詩〉第十九篇：「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魏）阮籍著；李志鈞等校點：《阮籍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 93。

⁵²〈詠懷其六十二〉，（魏）阮籍著；李志鈞等校點：《阮籍集》，頁 121。

⁵³〈詠懷其四十五〉，（魏）阮籍著；李志鈞等校點：《阮籍集》，頁 110。

⁵⁴（春秋）孔子著，劉兆偉譯註：《論語》，頁 254。

⁵⁵〈詠懷其十九〉，（魏）阮籍著；李志鈞等校點：《阮籍集》，頁 93。

⁵⁶（清）何焯著：《義門讀書記》（香港：中華書局，1987），頁 902。

⁵⁷〈詠懷其六十三〉，（魏）阮籍著；李志鈞等校點：《阮籍集》，頁 122。

⁵⁸〈釋私論〉，（魏）嵇康，殷翔、郭全芝校注：《嵇康集註》（安徽：黃山書社，1986），頁 231。

⁵⁹〈大人先生傳〉，（魏）阮籍著；李志鈞等校點：《阮籍集》，頁 66。

⁶⁰（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160。

乃儒服，其說乃墨夷」，⁶¹諷刺那些言行不一的偽君子。從皇祐元年（1049）起，梅詩中越來越高頻率的直接流露出對阮籍的傾慕之情。一方面是隨着年歲漸長，仕途上卻前路坎坷，尤其慶曆革新失敗後，梅堯臣對政治的熱情如當年阮籍般逐漸泯滅⁶²，開始嗟嘆人生苦短。另一方面，自皇祐三年（1051）獲皇帝召試得太常博士之官職後，梅堯臣的生活條件較早年逐漸穩定、優渥，開始形成了一種隨緣自適的生活態度。〈張聖民席上聽張令彈琴〉、〈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都正能體現梅堯臣晚年閒適淡然的生活狀態。

2. 濟世之志與隱逸之心的矛盾

《晉書·阮籍傳》載：「（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⁶³阮籍壯年時曾經登高望遠，豪情壯志，意氣風發。《詠懷》第38篇：「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原，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⁶⁴阮籍認為視榮枯生死於虛無的莊周（前369-前286），死後依然會捐身荒野為鳥獸所食。不如戎馬沙場，從此功名遠揚。可見阮籍雖然形在江湖之上，沉醉於玄學之風，卻難以掩蓋住其內心深處可望有所建樹的濟世之志。只是當時社會環境的險惡使他迫不得已而隱居竹林，避世清談。

而梅堯臣雖然在朝為官數十載，52歲（1053年）以前卻幾乎從未得到重用，單就仕途上來看，梅堯臣到老也未能實現年輕時的志向，因而晚年時常流露出一種對於官場的倦怠：例如「高低趣向難為合，冷暖情懷固飽諳」；⁶⁵「我豈不知命，人空嗟其窮，何當遂逸性，川上作釣翁」；⁶⁶「便從冠帶向仕途，強顏希祿非貪職」。⁶⁷梅堯臣在過世的前一年（1059）的〈次韻和吳沖卿歲暮有懷〉寫道：

舊曆卷將盡，慨然增永懷。唯希步兵醉，莫作太常齋。
孟浪從人笑，疎愚共世乖。定知當汨沒，名不與功偕。⁶⁸

⁶¹（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799。

⁶²牛苗苗：〈梅堯臣詩歌創作心態及其詩風研究〉，頁19-26。

⁶³（唐）房玄齡：《晉書》，卷49〈阮籍傳〉頁1361。

⁶⁴〈詠懷第三十八〉，（魏）阮籍著；李志鈞等校點：《阮籍集》，頁105。

⁶⁵〈依韻和春日偶書〉，（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842。

⁶⁶〈依韻和劉原甫舍人赴揚州途次贈予翩翩河中船〉，（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865。

⁶⁷〈吳沖卿學士以王平甫言淮甸會予予久未至沖卿與平甫作詩見寄答之〉，（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880。

⁶⁸（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1067-1068。

在舊年將盡的時刻，詩人心中感慨惆悵的情緒常常會比較濃郁；回顧自己的一生，寧願能如阮步兵一般借酒佯作糊塗、放誕，也不想再為從七品太常博士的官位掙扎，浮沉一世。從某一方面來看，同樣是徘徊在「出世」與「歸隱」之間，雖身處盛世，晚年的梅堯臣對處於亂世之中報國無門的阮籍有一種莫名的欽羨之感。雖然同樣是未能實踐政治抱負，但阮籍是因時勢所迫無奈而如此，而自己卻是未曾受到皇帝真正的賞識。他希望自己也能夠像阮籍一樣酩酊大醉、放誕真率，將名利都視為身外之物。但梅堯臣自己始終是個塵世中的凡人，無法擺脫對功名的嚮往，更無法免於生計之迫。這種真實的自我狀態與理想中超我形象的衝突，構成了梅堯臣晚年隱逸之心與早年濟世之志的矛盾，心理上認為與魏晉之際的阮籍所處同樣的困境之中，因而產生精神上的共鳴，在詩中更多提到理想中的文士形象——阮籍。

（二）詩論變革的沉澱

近現代學界普遍認為梅堯臣詩風平淡、瘦硬，並盛行「平淡學唐人」說。例如張宏生在其《宋詩：通融與開拓》中寫道，「他（梅堯臣）的詩，早年師法王維（699-761）、韋應物（737-792），中年以後，又在王、韋之外加上了韓（愈）、孟（郊），同時命意用筆又多有本於白居易處」。並認為他的詩因此而產生老健勁峭、平淡簡遠之風格。⁶⁹但橫山伊勢雄在論文〈梅堯臣的詩論〉中進行專述，認為梅堯臣的平淡未必學唐人，而是一種對唐詩激情的反撥，是激盪後的沉澱。⁷⁰

梅堯臣在〈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中提出了自己的詩論主張：「聖人於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⁷¹；在〈讀邵不疑學士詩卷杜挺之忽來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輒書一時之語以奉呈〉中也闡述了「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⁷²的觀點。從〈依韻和晏相公〉的「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辭未圓熟，刺口劇菱芡」⁷³中，也可看出梅堯臣也認為追求平淡的過程要經過反復的苦吟與錘煉，最終才達到海納百川的平淡境界。從早期的清麗之平淡，到晚年的老勁之古淡，梅堯臣經歷了迸積、思索、感興發會的過程，並且在這個過程中顯示出多樣性與廣闊的涵蓋包容。⁷⁴也就是說，隨着年齡的不斷增長，知識的不斷積累，也是對

⁶⁹ 張宏生：《宋詩：通融與開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頁 11。

⁷⁰ 〔日〕橫山伊勢雄著，張寅彭譯：〈梅堯臣的詩論〉，頁 54-55。

⁷¹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336。

⁷²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845。

⁷³ （宋）梅堯臣著，朱東潤校注：《梅堯臣集編年校注》，頁 368。

⁷⁴ 許總：《宋詩：以新變再造輝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頁 189。

早年時西崑體變革的需要，梅堯臣在探索中對於復古、對於《詩經》的接受程度不斷提高，這種以復古精神打破時代流弊、重建新的審美風格的需求不斷增長。作為一個開拓者，為變「西崑體」浮靡之風，為「造平淡」，他必須去尋找更深遠、純粹的「復古」，而阮籍之「詠懷」就是梅堯臣不斷探索後的歸處。同樣地，阮籍通過越禮驚俗、放言忤世塑造了自己的理想國度，喚醒了文學的自覺和詩的新變，引領着一代文人風尚；梅堯臣也在詩歌創作的方面開一代之新風，形成了不同於唐人的平淡詩觀，新的價值結構。

五、結語

時代更迭之際，往往是變革者的舞臺。阮籍在魏晉政權更迭之際，看似醉心莊老、隱逸於竹林而不聞世事，實則以實際行為與世抗爭，代表了一代士人之覺醒；同樣地，梅堯臣作為宋初詩歌新變之困境的探索者，展現出了典型宋代士大夫的社會責任感、個人的自覺與現實關懷，並在不斷的探索中取得突破，成為唐風到宋調轉變的奠基者之一。在梅堯臣詩歌的接受史上，梅堯臣也是宋代提及阮籍次數最多的詩人。筆者從梅堯臣共五十餘篇與阮籍有關的詩作中，簡略剖析了梅詩中與「酒」和「竹」意象密切聯繫的阮籍形象與梅堯臣晚年對阮籍推崇程度提高之原因及意義。

首先，在對於梅堯臣所作涉及阮籍的詩歌中，按照時間順序歸納，可發現梅堯臣在晚年時期所創作的涉及阮籍的詩歌較中早期所佔數量比較多，可以猜測這與梅堯臣的生活狀態、心態變化都有一定關係。其次，這些「涉阮」詩在內容上存在共同特點，具體表現為較為固定的「酒」和「竹」的意象搭配，和頻繁的典故使用。本文由於篇幅限制，只展開論述了固定意象搭配的方面，即梅堯臣與阮籍同樣有飲酒的嗜好和對竹的偏愛，展現出宋代飲酒風氣的盛行、文人渴望借酒忘憂的心理，梅堯臣對「竹」之君子高潔、淡泊形象的嚮往，總結出作為梅堯臣情感符號載體的符號化的阮籍形象。再次，對於前文得出的——「梅堯臣晚年對阮籍詩接受程度提高」這一結論的深層原因探究中，筆者從梅堯臣個人和時代背景兩方面着手，推測出梅堯臣在晚年時期個人情感卻變得更為複雜，包括莊老之學與儒道的相互碰撞、壯志未酬與渴望歸隱之心的相互矛盾，以及同樣作為各自時代詩壇的變革者，使梅堯臣對於阮籍在精神層面產生了更加強烈的情感共振。